



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

——李致忠先生基于“虚鉴实考”理论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赵宣

摘要 此文是对版本目录学李致忠先生的访谈录,内容之一是关于两宋版本鉴定;之二是关于活字泥版、磁版及铜活字本等特殊类型版本的鉴定;之三是古籍著录工作中常见问题举隅;之四是例释“玄学鉴定法”与“虚鉴实考”之关系。访谈旨在揭橥李致忠先生的版本鉴定方法、经验与案例,彰显其学术理论对推动版本学健康发展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 李致忠 宋版鉴定 古籍著录 虚鉴实考

分类号 G256.2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2.016

1 引言

李致忠先生在古籍版本学界可谓望重名高矣。先生1938年出生,北京昌平人。196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旋即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曾先后担任过善本特藏部主任和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期专注于古籍整理、版本考订、目录编制及目录学、书史、出版史诸领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要著作有《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商务印书馆,1991)、《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古书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肩朴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中国文化通志·典籍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古籍版本知识500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中国典籍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简明中国古代书籍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中国出版通史(宋辽夏金元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中国古代书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昌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文苑英华〉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整理

出版了《今言》(中华书局,1984)、《鄂尔泰年谱》(中华书局,1993)、《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筹海图编》(中华书局,2007)等近十余部古籍;主编有《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中国古代版印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四部丛刊四编》(中国书店,2017);主持了《中华再造善本》编纂及其提要撰写工作。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规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 两宋版本鉴定

作为宋王朝校刻的定本,北宋版均是优良版本,覆刻本次之,以后的元明清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也逐渐降低。作为国内外公认的宋版研究权威,两宋版本鉴定毫无疑问地成为我们访谈的首选重点。

2.1 北宋本鉴定

根据尾崎康先生的考察,外典中的北宋版,能够确定为北宋版的,在日本的只有十部,在中国大陆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BTQ040)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TQB008)“口述史方法下的中国大陆当代古籍版本学家鉴定经验整理集成与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赵宣,ORCID:0000-0003-4745-888X,邮箱:zhaoxuan_lib@yzu.edu.cn。



只有三部^[1]。他还以刊记、高丽国藏印、特殊缺笔等归纳出一些基本的鉴定方法。先生则坦言，目前学术界于宋版研究仍多局限于南宋刻本，且很少与佛经刻本尤其是北宋佛经刻本相结合，故总结出的宋代刻本特征还难免流于片面。尽管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已方兴未艾，但从五代刻九经延及北宋仍属于初期，凭眼力可以看出其古朴，比如书口的不正规与狭窄，甚至窄至像应县木塔的辽代佛经，但是每一种北宋本又不尽相同，因总量流传甚少故还难以概括出其共性特征。

以西泠印社艺术品拍卖公司藏宋刻颜体《妙法莲华经》七卷为例。（后秦）鸠摩罗什译，（隋）天台智者疏并记，（宋）四明沙门道威入注。半叶六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上下单栏，无界格。每版五折，总计325版，801开，1602面。版框高25.5厘米，宽13.3厘米。开本高30.2厘米，宽13.4厘米。经折装。《妙法莲华经》有“诸经之父”“经中之王”的美誉，故历来写印频出、传本极多，然援疏入注合刻者较少，以颜体字写样上版并传之于世者则更少。遗憾的是，该书并无具体的刊印年份，只有一些迹象可资考镜，倘能对这些迹象综合分析考察，亦可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开版结论。先生认为，据卷前所镌《妙法莲华经入疏缘起》、卷一末所镌“杭州助教弟子林茂施财开此品庄严佛果者”题记、同时出现的北宋末南宋初刻工以及四明宝云寺之历史，均表明此经之刻有可能在北宋末南宋初。此外，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讳”字条载：“本朝著令则分名讳为二：正对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若先朝帝名，则改名为讳，是为庙讳也^[2]”以此检验是书，发现匡、玄、竟、弘等字有缺笔避讳者，但并不严格，而北宋末帝钦宗赵桓御名“桓”字，在此书中凡七见，均不避讳。南宋首帝赵构之御名“构”字在此经中也是七见，同样既不缺笔避讳，也未见以小字“今上御名”或“御名”相替代，表明此经之刻更未至南宋高宗临朝执政之时。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曰：“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3]。”可以说，颜体字在北宋的社会影响是十分深广的，尤其是宰相韩琦独好颜书，影响朝野上下的士人皆学颜字，这就造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风气，流风延及雕版印书的写样上版，因此北宋刻书的字体多浑朴厚重，颇存颜字风韵。今天存世的北宋刻书虽少，但我们从北

宋所刻释家大藏零种或单经中，还不难见到颜体字在书刻中的流风余韵。此本无论是经文大字，还是注文小字，字体皆仿颜书，而且仿得惟妙惟肖，几乎不爽毫厘，在宋代颜体坊刻中是不多见的。

作为两宋科举考试的权威官韵，丁度等奉敕所撰《礼部韵略》五卷具有崇高的地位，影响深远，先生详细讲述了这部珍若拱璧的北宋孤本亮相北京匡时专场秋拍会的鉴定经过。我们知道，新发现的这部《礼部韵略》不仅比日本真福寺藏本刊刻时间早，而且去声、入声两卷保存完好，可补真福寺之失，其重大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堪称二百年来的古籍界的重大发现，而先生2012年在南昌初见此本时，它还是每一页都用一个塑料薄膜夹着的97张散页，在先生的直接关心与指导下，国图修复中心一位老专家为此耗时整整四个月，才终以一函五册整书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皮纸印造，纸质较粗，字体古朴，刀法古拙，墨色乌黑而不莹，版口狭窄，未形成定式，与20世纪70年代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刻本《蒙求》一书相似，亦与寻常所见南宋刻本书迥异。在详细考查了书中的所有避讳字后，先生发现，其严格回避宋真宗赵恒之讳，而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则均不回避，从而判断此书成于北宋仁宗一朝，再结合文献中《韵略》的成书时间，进而断定其刊刻应在北宋景祐四年（1037）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之间。“至于说它绝非北宋国子监官刻，不但其版式、书口、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等直接告诉人们它非官刻，某些历史背景也能帮助我们判定它是否为北宋官刻。……江西新发现《礼部韵略》基本可以肯定是民间坊肆翻刻，……《韵略》是应举子科考诗赋而产生的工具书，这类书收字归韵一定要准确，避讳之字不能含混其词……即或是民间坊肆翻刻，也不敢在这两点上掉以轻心，……因此该书的讳字状况，应该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其版刻时段的依据^[4]。”

宋代大词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曾如此评价宋代各地刻书，“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5]。”京师汴梁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自不减杭州和其他地方，但历经三十年探索，先生仍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至今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宋汴梁刻本；国图所藏宋刻《五臣注文选》，究竟是刻于北宋还是南宋？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书卷三十后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条记一行,先生认为,宋南渡以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改杭州为临安府,此条记正说明刊刻至晚应在建炎三年以前。字体端庄古朴、风格肃穆,凭眼力亦可断为北宋刻本,只是苦于残损严重,至今还未找到可以支撑结论的考证材料,所以还不宜贸然得出结论。

2.2 南宋本鉴定

此次在国图善本阅览室,我们有幸调阅了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福建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重刻本《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与清影宋刻本《友林乙稿》。前者系潘氏宝礼堂之旧藏,如果单从版刻风格、字体风貌、纸张墨色等看,确实很难辨识它的真实面目,因此从潘宗周、张元济直至赵万里诸先生都著录为宋刻本。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山东发掘明初鲁荒王朱檀之墓,恰好出土文物中也有此书,先生经在两相比勘后发现,在行款字数、字体风韵、刀法技巧乃至墨钉断版等方面均完全一样,证明两者确实系相同版本,但出土的那一部在卷三十二末叶的下半叶镌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条记一行,而国图藏本此行刻书条记已被割裂后用相近的印纸粘补过了。谛审再三,我们发现纸张确实还是颇有差异的。先生强调,武夷詹光祖刻书从南宋末期开始后一直绵延至元朝,其刻书风格基本一仍其旧,谁看错了都不能算什么毛病,“虚鉴”之下它就是宋刻本。但是这也提醒我们,鉴定过程中凡遇到书前卷尾应该有年款或其他什么痕迹的地方,非但没有任何证迹,反被另纸挖补过,就一定要留心谛审,多方“实考”,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黄丕烈旧藏《友林乙稿》一卷,(宋)史弥宁撰,顾莛题签,袁克文、李盛铎跋,高世异、徐森玉等题款。框高21.4厘米,宽14.4厘米,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先生认为,此书之初刻当为南宋嘉定七年郑域湖南邵阳刻本,惜已湮灭,传世者皆清影宋刻本。先生以国图所藏三部清影宋刻本与此书比勘,发现黄氏原藏这部所谓宋刻本,不仅《登雁峰一首》的九字墨钉被挖补,以素纸补空,而且书叶的用纸,天头地脚与版心并不一致,书眉用纸是找旧纸接补上去的,以示陈旧,乱人眼目。钤有“宋本”、“佞宋”、“土钟”、“閩源印”、“三十五峯园主人”、“汪士钟读书”、“寒云鉴赏之鉢”、“惟庚寅吾以降”、“袁克文”、“上第二子”、“寒云”、“抱存小印”、“寒云秘笈

珍藏之印”、“寒云小印”、“后百宋一廛”、“与身俱存亡”等印记,又有“天锡收藏”及“学古”等印记,黄丕烈审为元人印鉴,实伪。

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司马光尝疏请崇文院校正《荀子》《扬子》《文中子》,并俱送国子监刊行。国子监接受司马光建议,遂将三子校正后下杭州镂版,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三书刻成,是为北宋国子监刻本。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在浙江台州重刻三子,以熙宁本为祖本,并在版式规制等方面一仍熙宁之故,以是台州本三子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2007年,辽宁省图书馆发现了《扬子法言》十三卷《音义》一卷,(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祕、司马光五臣注本。先生审定其正是宋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台州公使库刻本,乃北宋国子监本的翻刻本,渊源有自,系统分明。反观20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国图所回购香港陈清华之郇斋藏书,其中有宋版《荀子》一部,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即台州本。先生在主持《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时,对郇斋藏《荀子》要求重新鉴定,并首先在讳字上寻求突破,在逐一爬梳后终于发现,“敦”“扩”两字阙笔,已讳至南宋宁宗赵扩,而台州本是孝宗淳熙时所刻。再来看刻工,台州本《扬子法言》的第一个刻工就是蒋辉,他本是明州(今宁波)的一名称字工人,因同方百二等一起为人私刻东南楮币而获罪,由临安府府院发配到台州牢城监管。时唐仲友正在台州任上,乃胁迫蒋辉继续刻楮币与《扬子法言》,而在《荀子》一书中却没有发现刻工蒋辉。因此,先生认为,郇斋藏《荀子》乃为台州本的翻刻本。至于钱锜在江西翻雕的《荀子》,其底本亦是北宋熙宁国子监八行本,现已流落海外。由此,先生不无感慨,当年前辈们无缘得见台州本《扬子法言》,其虽行款相同,但字体也不一样,而用讳字鉴定版本,一定要把讳字查到底。“高”、“孝”、“光”、“宁”、“理”几个时期是很严格的,尤其要留意宋钦宗赵桓,徽钦二帝北掳,上至朝廷下到民间都特别敬重与同情,所以对“桓”字避讳相当严格,特别在南宋中期以前。因此,我们不能一看到“桓”字避讳就认定是北宋刻本,相反倒可能表明它已是南宋刻本,所以一定要学会辨证使用讳例。

针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大陆没有宋刻十行本的十三经,先生则明确持不同意见。他以国图所藏一部《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为例,定其为“宋刘



叔刚刻本”毋庸置疑。在全面系统梳理十三经注疏版刻的基础上，先生指出，最初在实践上将经、注、单疏合刻在一起者，是南宋的两浙东路茶盐司，而南宋国子监未曾合刻过群经注疏。南宋建安一经堂主人刘叔刚确实汇刻过附释音群经注疏，元代翻刻时，只是将宋时刘氏原刊的书口由细黑口变成了白口，并在变白之处镌雕本版的大小字数，其余版式行款则一仍其旧。因此，现存附释音《十三经注疏》不宜简单著录为“元刻明修本”，要客观反映其中有宋刻、元翻，也有明刻，有宋刻元修、元刻明修，也有元明递修，应该著录为“宋元明刻元明递修汇印本”，汇印的时间当在明代。

3 活字泥版、磁版及铜活字本等特殊类型版本之鉴定

继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之后，文化部、财政部又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全面保护中华古籍特藏的庞大的、颇富远见卓识的姊妹工程。在这前后两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中，先生不仅是主导者，也是主要参与者，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古籍定级标准》，既是有效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基石，也是全国古籍工作者的工作指南。因此，《中国古籍定级标准》视域下的某些特殊类型版本鉴定成为我们访谈的另一个重点。

3.1 活字泥版与清代磁版印本鉴定

在《中国古籍定级标准》中，清代泥活字印本纳入二级古籍丙等，但清代磁版印本与活字泥版印本则归入一级古籍丙等，体现的正是先生一贯倡导的古籍定级之珍贵标准：时间早、流传少、价值高。以《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二十六卷四十四回为例，清人吕抚不仅首创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泥版印书技法，即采用了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相结合的办法，用泥活字字母制成泥版进行整版刷印，更总结了自己的印书工艺，撰成《印字物件列后》一文附在本书第二十五卷末，详细记录了这一新的印书技术，而活字泥版印书存世仅两部半，且能确定无误为活字泥版的仅吕抚这一种书。

就磁版印本而言，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王献唐、潘吉星诸先生在内，很多学者认为就是磁活字印本，为此，我们特意调阅了泰安徐志定于清康熙年间印制的《周易说略》与《篙庵闲话》两书。排字整齐，墨色均匀，目验所及明显比活字排版印刷精致，而且

前者之卷一第四十八叶和卷七第十叶、后者卷一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叶，均有非常显著的书版断裂现象。因此，先生一贯比较认同魏隐儒先生的观点，认为它是先制泥版雕字、再入窑烧造而成磁版的，在烧造过程中，可能因火候不均或泥性未熟而发生裂痕和行线弯曲。

3.2 铜活字印本鉴定

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针对明代究竟有没有铜活字印本，聚讼纷纭，悬而未决。在《中国古籍定级标准》中，明代铜活字印本入一级古籍丙等，清代铜活字印本入二级古籍丙等，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的正是先生对铜活字印本所持的基本态度。众所周知，由于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雕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时间，连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地都引起了争论。在连续撰文予以正面回应的的基础上，先生认为，就目前所知，朝鲜人在活字印刷术发展进程中，最突出的推进性贡献是最先创制了金属活字。大约在高丽王朝的高宗时代，即十三世纪的上半叶，他们已经有了金属活字印刷的技术，比我国元人王祜“近世又铸锡作字”的说法大约要早三十年左右，而且很可能就是铜活字，只是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铜活字应该都是铸造的。同样，在我国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即公元十五、十六世纪之交，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所出现的金属活字印本，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此番在国图古籍馆，我们主要调阅了明弘治十五年(1502)金兰馆铜活字排印本《石湖居士集》和明弘治十六年(1503)本《西庵集》。字体秀丽，笔画挺拔，小而精细，与华、安两家粗犷的风格迥然不同。至于金兰馆究竟属于谁家的室名、斋号，赵万里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中疑为昆山顾恂家的斋号，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佐证材料。先生还特意补充介绍了清康熙吹藜阁铜活字印本《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与清道光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印本《铜板音论》三卷《铜板诗本音》十卷的大致情况，他认为，明代的铜活字印书事实上代表了印刷术的发展方向，虽然势弱却蕴含着本质的变化，只是在无前序后跋的情况下，一般不要轻易下结论，毕竟判断材质是非常困难的。

“眼学”视域下的“鉴定”，主要依据事物表面上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部分，而对其内在状态并无所知。当下，借助科技手段则不仅可以掌握事物表面的情



况,更可认识其内在组成。以明代究竟有无铜活字印本为例。科技与人文专家以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为切入点,发现我国在明代中期以前盛产青铜,主要由铜、铅、锡合金组成,从现代冶金学的角度来看,其质地坚硬,适合铸造却很难雕刻;明代中期以后盛产的黄铜,则主要是由铜和锌组成的合金,其中仅由铜和锌组成的黄铜又称为普通黄铜,为了提高黄铜的耐蚀性、强度、硬度和切削性等,在铜锌合金中加入少量锡、铅、锰、铁、硅、镍等元素就构成三元甚至多元合金,即复杂黄铜,亦称特殊黄铜。由于铜锌固溶体具有较好的固溶强化效果,因此黄铜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而且强度和塑性还会随着含锌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铜活字印本之所以会肇始于明代中期了。先生指出,明清时期的所谓铜活字,实质上就是二元黄铜或多元黄铜的合金,锌的加入至关重要,统而言之则谓为金属活字,其流传少、价值高,因此古籍定级标准普遍较高。

4 古籍著录工作中常见问题举例

著名哲学家、国图老馆长任继愈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图书馆的服务核心在于文献揭示,“图书馆的职责就是为读者提供文献阅读,更何况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躺在图书馆里的书,怎能发挥其作用?但是又如何克服文献保护和读者阅读的矛盾?任先生想到了文献整理与揭示^[6]。”如果具体到图书馆古籍工作,文献揭示之基础无疑乃是古籍著录,而决定著录质量的高低者,尽管各项都很重要,但首先取决于版本著录准确与否,因为只有版本著录准确,才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科研依据。所以,古籍版本著录工作中存在的常见问题成为我们访谈的第三个重点。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致忠先生即敏锐地觉察到了古籍著录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但单凭序跋年限就公然断定一书版刻年份的现象依然存在”,“就算是注重刻书依据的,由于其依据的取舍极不一致,加上著录时不考究概念表述的区分……于是就出现了出版者与刻书铺相混,主刻人与梓行工匠并提的现象^[7]。”有感于斯,先生大声疾呼,希望古籍版本界给主刻、刻本、刊行、印行规定特定的概念。令人扼腕的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古籍版本著录工作所存在问题依然改观不大。以国图所藏《沧浪吟》一卷《诗话》一卷为例,框高19.1厘米,宽13.2厘米,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

单边,一直被著录为“清顺治十年(1653)周亮工诗话楼刻本”。在先生的率领下,我们特意调阅观摩了该书。此书卷前有周亮工顺治十年(1653)所写《重刻沧浪诗话序》,而周亮工入闽为官始于清顺治四年(1647)丁亥,其时樵川已发生叛乱,樵川在福建邵武北部,正是当年严羽的家乡。至顺治九年(1652)壬辰,盱江判卒又阑入其中,事态进一步扩大,周亮工身为闽省右布政使,只好驰车前往晓以利害,避免了束伍哗变。秣陵王闻上、金沙虞后来则以江左名彦身份分莅是邦,二人并以风雅相鼓吹,因与周亮工谋刻严羽《沧浪吟》及《沧浪诗话》,刻竣后请序于周亮工;目录后所镌与此书之刻有关人员籍贯姓名六行:“宋樵川严羽仪卿著;大梁周亮工元亮订;秣陵王誉命闻上、金沙虞宁后来梓;同里朱宿璧符、张孟玫龙玉编”,周亮工的角色则一目了然,他只是修订而不是刻梓,刻梓者乃是王誉命闻上和虞宁后来。先生指出,著录工作中之所以会将此书错定为“清顺治十年(1653)周亮工诗话楼刻本”,盖是此书卷前有竖分三栏之内封;右栏竖题“浚水周栎园先生重订授梓”,中栏竖题“宋严沧浪先生全集”,左栏竖题“诗话楼藏版”,而诗话楼恰恰向来都被误认为是周亮工的斋号。事实上,“周栎园先生重订授梓”是说此书经过周亮工重订之后才授之梨枣,并非是周亮工修订之后自己将其授之梨枣;而诗话楼指的是经过周亮工重新崇饰并命名用以祭祀严羽的冥楼,故“诗话楼藏版”指的是印刷告竣之后版片藏在诗话楼,也就是藏在祭祀严羽的冥楼。因此,此书准确的版本应著录为“清顺治十年(1653)王誉命虞宁刻本”。先生强调,古书藏版处与刻书处绝大多数是一回事,但有清一代的例外也不是没有,这就需要所有古籍工作者在版本著录时特别留意。

5 例释“玄学鉴定法”与“虚鉴实考”之关系

“中国古书版本学是以中国古代图书为对象,以版本鉴定为核心,以考订为主要方法,凭借多学科知识,借助校讎学,利用目录学来完成全面揭示图书的任务,并忠实地为中国古代社会各学科研究服务的辅助性科学^[8]。”李致忠先生一向认为,版本学的核心内容虽是版本鉴定,但其绝不是古籍版本学的全部内容,且鉴定仅靠直观判断势必沦为“玄学鉴定法”,鉴定是搞版本学的基本功,考订才是老老实实在的学问,两者不可偏废,主次更不可颠倒,综合运用



更易奏效。有鉴于此，先生一贯倡导的“虚鉴实考”理论成为我们访谈的最后一个重点。

5.1 宋庐陵刊本《资治通鉴纲目》

2017年3月，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杨柳女士携宋版《资治通鉴纲目》第二十三卷一册，专程赴京呈请先生鉴定。此书框高21.6厘米，宽16.3厘米，每半叶八行，行十五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刻字近柳而稍肥，棱角峭厉，端庄凝重，纸质莹洁，墨色清纯，初印精美，一派宋版书气息。仅凭直觉，先生就感觉与几年前在浙江大学所见到的第四十五卷一册是相同版本，宋刻无疑。该书零帙共十四卷十四册，分藏在七个单位、一位个人、一家拍卖公司，虽都是相同版本，但它究竟是宋代何时、何人、何地所刻呢？在缺乏“实考”的情况下，以往古籍版本界只能笼统著录为“宋刻本”。此番，先生偕杨柳女士一道拜访了诚轩拍卖有限公司顾问胡星来先生，蒙胡先生慨然展示其所藏之第五十九卷一册，更将后跋扫描相赠。经对此“后跋”一番抽丝剥茧式的条分缕析后，其版本面貌始昭然天下。

根据胡星来藏本之后跋，我们可以基本理出《资治通鉴纲目》发刻庐陵郡庠的大致脉络和较详细的经过。首先，宋嘉定十一年戊寅（1218），莆阳郑先生守庐陵，以是书传布未广，遂捐出自己的薪水二千五百缗，发刻此书于庐陵郡庠。在开雕之前，令饶谊和刘宁季等先行校正，三阅寒暑，其间又有金华章先生、四明史先生继守庐陵，最终完成了此书的校刻工作。其次，写跋的饶谊乃朱熹的门生，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写跋时的职务是庐陵郡文学掾，写跋的时间是宋嘉定辛巳夏五月十五之后，距戊寅莆阳郑先生守庐陵捐资令刻此书，恰是“三阅寒暑”。因知此书刻定当在宋嘉定辛巳，即宋嘉定十四年（1221），较温陵本仅晚两年。其三，开版地点在庐陵，即吉州，承刻单位是庐陵郡庠，出资者是莆阳郑先生。一般而言，古书的出版者，多指出资人或主持人，饶跋明确指出“捐俸二千五百缗”将《资治通鉴纲目》刻于庐陵郡庠者乃“莆阳郑先生”。问题是，这位郑先生究竟是谁呢？在逐一检核宋洪迈《容斋随笔》、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清王椿《仙游县志》、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宋赵希弁《读书附志》等大量典籍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根溯源后，先生考定其人为莆田郑寅。在里贯、历官、为人、志趣诸方面，郑寅都能与饶跋所记相契合，而且其守庐陵时确曾刻过书，《资治

通鉴纲目》盖其中之一。概而言之，第五十九卷卷末有饶谊后跋，参与校正者又多为庐陵当地人；避讳之字已至“廓”字，刻工又多为吉州名工，故先生将之审定为“宋嘉定十四年（1221）郑寅庐陵郡庠刻本”，言之凿凿，精深邃密，信而无疑。由此可见，“虚鉴”下我们获得的仅仅是版本的初始印象，只有经过“实考”后方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科学结论。

5.2 明嘉、隆、万三朝版刻之差异

“物见本主会说话”，先生一贯如此形象地概括“虚鉴”的作用。尽管毫不小视，但先生更加坚信，当下的古籍版本学如果不能把“虚鉴”纳入时代大背景下加以考述的话，如果不能从学术背景这个根本上说清楚，就势必会陷入游谈无根之境地。以明嘉靖至万历时期的刻书风格“白口方字仿宋”为例。因为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向统治文坛多年的“台阁体”展开了猛烈冲击，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潮流，反映在刻书上才会有风格一洗前朝旧式，全面复“赵宋”之古。因此，这一时期的刻书几乎都是横轻竖重、方方正正的仿宋字，并且纸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右双边，颇有宋版遗韵；嘉靖一朝计四十五年，隆庆一朝仅六年，尽管国祚短促，其字体风格之变化已现端倪，至于讳法始密，更是统治者加强思想钳制、强化封建统治的具体反映；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后期字体由方变长，行格由疏变密，则完全是社会日薄西山、经济衰退、财力拮据的表现。这就是时代大背景反映在刻书上的具体表现。但是在普遍风格之下亦有特殊个案，如杨慎某书，“虚鉴”之下即不是嘉靖时期风格，而属于正德或以前的风格。先生强调，“虚鉴”更似一种道行，须长期修炼后方能开花结果，但经验不能拿出来一味生搬硬套，还必须到实践中去反复验证，只有待感性上升到理性了，再去反复试着应用才会逐渐步入庖丁解牛之境界。

5.3 明正统十三年（1448）书林王宗玉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刻书牌记早在唐朝时就已经有了，它既是判定版刻年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常常会成为造伪者的主要目标。此书国图藏四部，过去一向被认定为“明洪武二十一年书林王宗玉刻本”，直至浙江瑞安图书馆所藏此书的一块准确的刻书牌记被发现，才得以纠正多年的谬误。过去为什么都定错了呢？其原因就是国图所藏此书的这块牌记的紧要处丢失了，迫使古籍著录工作者不得不从风格上去“虚鉴”。该牌



记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第二叶的下半叶,造伪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唐季历宋以来”的“宋”字,被挖改成了“代”字;另一处是“大明正统”四字被剝去,而将“岁舍戊辰”上提。“唐季历宋以来”,显然是宋以后人的口吻,而“唐季历代以来”,则五代、宋、元、明人都可以这么说,但凡作伪者用明刻本充宋本,都会尽可能把时间搞得模糊一些;“岁舍戊辰”失去时代制约,于是推测为哪个戊辰都可以了。由此可见,从风格特点上大体判断版刻时地的“虚鉴”技能一定得掌握,但它只能辅助于初步鉴定版本,而绝不可能定位得完全科学准确。我们不能把这种主观经验型的技能当作灵丹妙药,必须谨慎从事、科学运用,既不可夸大它的价值,也不要低估它的作用,“虚鉴实考”、考源流、定是非,以求真为己任,才会裨益于古籍版本学之发展。

6 结语

古籍版本界普遍认为,目录著作是版本学借以表现的外部形态,一部版本目录专著的问世,通常能把这部目录编制者的版本学思想、知识、水平、功力等全部表现出来。先生则认为,更准确地说,提要目录(或称之为叙录)更能表达编制者的版本学造诣,因为它必须要讲清楚著录或判断版本的种种根据。有鉴于此,从撰写 200 余种的宋元版叙录,到领衔 1341 种《中华再造善本》的提要撰写,可以说呈现的正是先生

半个世纪以来一以贯之的版本目录学思想。

龚自珍有诗云:“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9]”,耄耋之年的李致忠先生,一生志不在做官为宦,半个世纪以来,惟聚精会神于版本学、目录学、古代书籍史、古籍整理及图书馆学研究,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

参考文献

- 1 (日)尾崎康.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13.
- 2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 (宋)程大昌.考古编(外六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04.
- 3 (明)谢肇淛撰,傅成校点.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40-241.
- 4 李致忠.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北宋刊本《礼部韵略》[J].文献,2013(2):9-10.
- 5 (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6.
- 6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的 310 室.//詹福瑞.俯仰流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69.
- 7 李致忠.古书著录杂谈(之一)——古书版本著录的取证与方式[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2(2):24-27.
- 8 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76.
- 9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三零三俭腹高谈我用忧.// (清)龚自珍.龚自珍诗文集[M].孙钦善,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60.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扬州,225002

收稿日期:2017年12月6日

Mr. Li Zhizhong's Study on Textual Bibliography Based on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and Logical Textual Research

Zhao Xuan

Abstract: Mr. Li Zhizhong puts emphasis on visual inspection for his study on Textual Bibliography. Meanwhile, he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profound textual criticism. One focus of the interview is his edi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two Song Dynasties. The second is to identify some special versions, such as movable type printing, magnetic plate printing, bronze movable type and so forth. What's more, many examples are given on how to handle the common problems while writing bibliographies of different ancient rare books. Incredibly, it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ysical appraisal and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and logical textual research. Not only does the article aim to demonstrate Mr. Li Zhizhong's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 experience and documentation in the field of edition identification, but it also manifests more beneficial inspiration to promote the Textual Bibliography.

Keywords: Mr. Li Zhizhong; Edition Identification of Song Dynasty;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Rare Books;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and Logical Textual Research